

浙东

管敏义 主编

学术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浙东学术史

主 编 管敏义
副主编 陈敦伟
钱茂伟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沪)新登字第 201 号

浙 东 学 术 史

主 编 管敏义

副主编 陈敦伟

钱茂伟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75 字数: 350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 199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1—1,000 本

ISBN 7-5617-1067-4/H·088 定价: 18.70 元

序

仓修良

我们祖国,地域辽阔,因此学术文化的发展以地域为限,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性学术文化和众多的学术流派,在古代交通不便等许多特殊情况下,往往如此,而古代浙东学术的发展则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全国学术发展中相当长一段时间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宋代以来,各地书院林立,讲学风气大盛,从而形成众多学派。尤其是江浙一带,在宋以后,经济文化发展一直居于领先地位,不仅人才辈出,各地藏书亦为全国之冠。宋室南渡后,定都杭州,浙江遂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而形成了“文化荟萃之邦”。于是浙东地区此时出现了以吕祖谦为首的“金华学派”,以陈傅良、叶适为首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首的“永康学派”等。在他们学术思想的影响下,经元明至清,在浙东遂形成一个颇具特色的学术流派——浙东学派,这个学派,对宋代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全国学术文化思想发展有着非同平凡的影响。需要指出的,尽管目前海外有个别学者否定有这个学派的存在,但他那种无视历史事实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显然是不能成立的,这个学术流派也决不会因为有一两个人的否定而就不复存在。事实上,浙东史学的殿军、杰出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浙东学术》一文中对这个学派的源流、统系已下了结论。

管敏义、陈敦伟、钱茂伟等同志,经过多年研究,编著了《浙东

学术史》一书，行将出版，请我为之作序，由于对这一课题我很感兴趣，故欣然同意。这部著作我粗略阅读之后，感到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本书写的是浙东学术史，但作者的视线并没有局限在浙东范围之内。他们除了论述探讨浙东学术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外，还将浙东学术发展中与全国学术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与分析。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学术发展总是互相影响、相互渗透的。这不仅表现在纵的受前人的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横向同时代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影响，尽管有其特定的区域性，但绝对不是封闭的。就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而言，就是有明一代学术思想史，他著此书的材料和内容显然都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派代表人物及其著作。万斯同的《历代史表》所记也不局限于浙东历史。再以黄宗羲与同时其他学者间交往来看，他们之间学术思想的交流也确实有着重大意义。如当黄宗羲具有杰出民主思想的著作《明夷待访录》一书问世后，一代大师顾炎武看了以后曾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给黄宗羲写了信，十分称赞，信中说：“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圣人复起而不易吾言，可预信于今日也。”（《顾亭林诗文集·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这就是说，该书在当时学者中已起了如此重大的影响。由于这部书有着浓厚的近代民主思想，因此在当时封建压力下虽得不到广泛流传，但在清末的民主革命运动中，却被大量印刷散发，曾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工具，起过很大作用。正如梁启超所说，《明夷待访录》一书，“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在三十年前——我们当学生时代，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的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黄梨

洲》)可见学术思想的影响,是不会受到地域限制的,不同地区的学者学术思想的交流会通过各种渠道在进行。因此研究地区性学术思想史注意与全国学术发展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这点,该书做得相当成功。

第二,作者在书中总结出浙东古代学术发展的重要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对今天学术界仍有借鉴价值。诸如博采、创新、求实、重史、爱国等。博采就是博采众家之长,不守门户之见;创新,就是都有开创精神,不墨守陈规;求实,就是实事求是,不空谈浮夸;重史,就是许多学者研究学问大多以史学为其出发点;爱国,则说明了许多学者在国家危难之际,多能以国家利益为重。这几点都很重要,这里仅就博采与重史两点谈些个人看法。博采众家之长,不守门户之见,确实是浙东学术一个最大的特点。与其空谈,还是举实例更能令人信服。就以金华学派的创始人吕祖谦而言,可谓十分典型。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全祖望这几句话,点出了吕祖谦的治学态度与特点是兼取众家之长。朱熹与陆九渊二人由于学术观点上的分歧,长期纷争不休。在历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上,吕祖谦特地设法让朱、陆二人都参加这次学术会议,会上想做些工作,协调两家的纷争,指出两家学说都有长处也都有短处,应当取长补短,相互学习,互相尊重。陆九渊的弟子朱泰卿曾随其师一道参加鹅湖之会,会后也曾这样盛赞吕祖谦说:“伯恭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其意甚善。”(《宋元学案》卷七十七,《槐堂诸儒学案》)对吕祖谦这一美好愿望和做法,今人著作中大多称之为“调和”或“折衷”,这种说法,实际上只看到现象上的“调和”,而没有看到吕祖谦的本

意,看来还不如全祖望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是“兼取其长”。朱陆之学无疑都有自己的长处,这一点恐怕谁也不会否定,既然如此,“兼取其长”有什么不好呢?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一文中有段议论,很值得人们思考。他说:“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牴牾;戴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抵也。梨洲黄氏,出戴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也。惟西河毛氏,发明良知之学,颇有所得,而门户之见,不免攻之太过,虽浙东人亦不甚以为然也。”又说:“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这就充分说明,浙东学派的学者,在做学问上虽然都有自己的学术宗旨,但却反对树立门户,主张学派之间,相互尊重,互相推服,取长补短,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学术的不断繁荣与发展。虽然浙西顾炎武宗朱,而黄宗羲宗陆,但他们之间却相互尊重与推服,为后来学者树立了榜样。众所周知,学术上一旦存在门户之见,必然产生相互攻击,宋明以来,程朱陆王两派之间交相攻讦,也为人们提供了反面典型,如此攻击,对学术发展有何益处!所以我认为对于浙东学者不守门户之见这一优良传统应当很好加以发扬。该书用显著地位加以总结,可谓抓住了重点。

其次要说明的是浙东学派的著名学者大多精通历史,他们的许多政治观点和主张,亦大多通过历史著作来体现和反映,所以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一文中十分自豪地说:“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文史通义》内篇五)《浙东学术史》一书,不仅抓住了这一特点,总结为浙东学术发展中优良传统之一,而且全书以此为主轴进行编写,可

见作者确实抓住了浙东学术发展的实质与主流。其实学术文化的发展总是与历史学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并且最早产生的亦为历史学，因此研究传统文化，决不能离开传统史学的研究，因为传统史学不仅是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核心，其它学科都是从史学辐射开去，因而离开了史学，一切文化现象都就无从谈起。正因如此，有的著作将史学称之为文化中的文化，应当说是很有道理的。众所周知，历史学是致力于人类社会整个文化领域，它要把人类社会自古迄今发展和变化全部显示出来，其它任何学科，仅是研究一个方面的知识，历史学则是研究人类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诸如哲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的发展，无一不是历史学探讨的对象。十分遗憾的是，我们打开许许多多的文化史论著，其中历史学竟很少有一席之地，对传统史学一窍不通的人，照样在大谈其传统文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怪的现象。

总之，《浙东学术史》一书，系统的论述了浙东学术发展的过程及规律，还总结出浙东学术发展的特点及优良传统，这是十分可喜的收获，它为进一步研究浙东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最后还想附带说明一个问题，《越绝书》是记载吴越争霸时期的一部地方性历史书，自明代以来，一直将它说成是东汉人袁康、吴平所作，《浙东学术史》也是采用这一传统说法。其实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一书中对此说已经提出怀疑。笔者于1990年在《历史研究》第四期上发表了《〈越绝书〉是一部地方史》一文，对传统的成书时代与作者作了否定。指出它的体例性质、成书过程与作者，都类似于《战国策》，也就是说，它是当时一些政治家游说吴越两国国君时的出谋划策内容，即关于治国用兵之道，由战国后期人追记整理汇编而成，决不是成于一时一人之手，流传过程中随时都会有人附益，东汉袁康、吴平最多也不过作了些“附益”而

已。正像《战国策》，在刘向整理定名之前，不仅有许多种本子在流传，而且名称也很多，有所谓《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经刘向加以重新编辑、校订，才定名为《战国策》，这样难道我们能够说它是刘向所作吗？所以传统说法决不可信。

题 记

章学诚首创“浙东学术”一说已有二百多年，但迄今为止，尚无一部《浙东学术史》问世，我们作为浙东人，总感到这是一件憾事。为了填补这一空白，从1988年开始，我们着手编写这样一部书。先由我拟订出编写提纲，约请对浙东学术有研究的同志参加，开了几次会，对提纲作了修改，然后根据各人的专长，进行分工，决定在各自深入专题研究的基础上，集体编写。1990年，宁波师院和宁波大学联合发起、召开了“浙东文化”研讨会，我们将此书内容在会上作了交流，得到与会学者的热情支持；他们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我们得益匪浅。1991年底，我们完成了初稿，而后又用了八个月时间进行修改、加工，于1992年8月定稿。

编写本书的分工情况如下：第一、二章和第三章中的一、二、七、八节，管敏义；第三章第三节，黄明；第四节，叶霞娣；第五、六节，徐鸿钧；第九节张伟、钱茂伟；第十节，俞信芳、张伟、钱茂伟；第四章第一节，陈敦伟、钱茂伟；第二节，张炳生；第三节，钱茂伟；第四节，陈敦伟；第五节，钱茂伟；第六节，陈敦伟；第七节，钱茂伟；第五章第一节，钱茂伟；第二节，徐定宝；第三节，成岳冲、马启鹏；第四、五、六节，钱茂伟；第七节，朱依群；第八节，王耀伦；第九节，王定焕、钱茂伟、陈鹏鸣。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和宁波师范学院领导的支持，杭州大学仓修良教授为此书写了序

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姜汉椿主任、责任编辑王焰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现借本书出版之机,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从全书来看,各章节的写作水平并不一致,其原因是我们水平有限,同时,也由于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有待于深入。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管敏义

1992年8月

目 录

序	1
题记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二章 汉唐时期的浙东学术	20
第一节 引论	20
第二节 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	25
第三节 《越绝书》	43
第四节 《吴越春秋》	49
第五节 三国至唐代的浙东学术	55
第三章 宋元时期的浙东学术	61
第一节 引论	61
第二节 “庆历五先生”与“永嘉九先生”	70
第三节 陆游的学术成就	83
第四节 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	92
第五节 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	111
第六节 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	125
第七节 甬上四先生	140
第八节 金华四先生	153
第九节 黄震及其东发派传人	169
第十节 王应麟及其深宁派传人	185

第四章 明代的浙东学术	206
第一节 引论	206
第二节 明初浙东学术	209
第三节 阳明学派兴起前的浙东学术	243
第四节 王阳明及王学的浙东传人	252
第五节 胡应麟的学术成就	281
第六节 刘宗周的学术思想	297
第七节 张岱的文史之学	308
第五章 清代的浙东学术	318
第一节 引论	318
第二节 清代浙东学派的开山祖黄宗羲	329
第三节 爱国学者朱舜水	344
第四节 万氏兄弟的经史之学	353
第五节 姚江书院派和邵廷采的学术成就	367
第六节 全祖望的学术成就	376
第七节 邵晋涵的学术成就	385
第八节 章学诚的学术成就	393
第九节 晚清浙东学术述略	408

第一章 导 论

“浙东学术”一说，首创于章学诚，我们沿用这一说法。本书所论述的是浙东学术发展的历史，上起汉唐，下迄清代。

本书所说的浙东，是指浙江下游（钱塘江）以东地区。也就是《浙江通志》所说的：“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凡八府，皆大江之左，是为浙东。浙东，春秋时期到战国前期属于越国，战国后期属于楚国。”在秦代属会稽郡、闽中郡。西汉武帝后，归扬州部的会稽郡。三国时属吴国。由于经济的发展，这时又新辟了东阳郡和临海郡。东晋时，又从临海郡中分出永嘉郡。南朝以后，从扬州部析置出东扬州部，浙东属东扬州部。唐初，浙东属江南东道。肃宗以后，分置浙江东道、浙江西道。自此，“浙东”一词作为行政区域开始沿用。五代十国时期，浙东属吴越国。北宋时，浙东属两浙路。南宋时，浙江析为浙东路和浙西路。此后，“浙东”一词约定俗成，经常在学者著作中出现。元代，浙东属江浙行中书省。明代属浙江布政使司。清代属浙江行省。“浙东”一词的内涵历史上虽有所变化，但多数学者的看法与《浙江通志》所说相近。（“浙东学术史”，是指浙东地区经学、哲学、史学等学术发展的客观过程。）本书是对浙东学术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进行论述。论述的范围，涉及浙东学术本身的发展，浙东学术在发展中跟全国学术的关系，浙东学术在发展中所反映出来的优良传统，各个历史时期浙东学者的学术成就及其在社会上的影响，等等。

浙东学术的发展，主要是依据历代学者和他们的著作进行研究。浙东人才辈出，著作繁富，本书选择其中在学术发展过程中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著作加以论述。

浙东学术随着历史时代的变动，有一个发生、发展、衰落和更新的过程。在学术成果上，既有一定的成就，也有一定的时代局限；在学术思想上，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和斗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矛盾和斗争、进步和落后、创新和保守的矛盾和斗争。这些，就是学术发展中有规律性的东西。

浙东学术发展的诸阶段

本书将浙东学术的发展分四个时期来论述：汉唐时期，宋元时期，明代，清代。

一、汉唐时期

这一时期，是浙东学术初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著名的史学家周长生、袁康、吴平、赵晔、虞预、谢沈、慧皎，著名的经学家虞翻、阚泽、贺琛、孔子祛，及博学多才的学者虞喜、虞世南等人。这一时期重要的哲学著作有王充的《论衡》；历史著作有周长生的《洞历》，袁康、吴平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虞预的《晋书》，谢沈的《晋书》、《后汉书》，慧皎的《高僧传》；经学著作有虞翻的《易注》，虞喜的《毛诗略》，注《孝经》，贺琛的《三礼讲疏》、《五经滞义》及《诸仪法》，孔子祛的《尚书义》、《集注尚书》、《集注周易》、《集礼论》；类书有虞世南的《北堂书钞》。

二、宋元时期

这一时期，是浙东学术繁荣阶段。其主要标志是：原来以会稽的山阴、上虞、余姚为中心的浙东学术，向明州、永嘉、金华、永康等

地区发展，出现了对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区域性的学派。这个时期可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北宋阶段，这是浙东诸学派的孕育阶段，这个阶段，有“庆历五先生”和“永嘉九先生”等在从事教育和学术活动，为浙东诸学派的出现准备了条件。第二阶段，为南宋阶段。由于宋室南渡，浙江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浙东的学术文化得到蓬勃发展，出现了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及传播陆学的“甬上四先生”和传播朱学的“金华四先生”，此外，还有爱国诗人兼学者的陆游。形成了全国罕见的区域性的争鸣局面。第三阶段，为元代阶段。南宋王朝的覆灭，浙江失去了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加之蒙古贵族采取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浙东的学术文化受到严重摧残，因而从繁荣走向衰落。但是，就在这个困难时期，浙东学者并没有放弃学术活动，在宋末元初，黄震及其东发学派传人对朱学作了修正，王应麟及其深宁学派传人胡三省等传吕学，开明清文献派之先河，“金华四先生”中的金履祥、许谦和他们的后学为理学北传及朱学在全国范围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

三、明代

明代是浙东学术十分活跃的时期，特别在思想史上有重大突破。其主要标志是王学的崛起，打破了程朱理学在学术界独尊的局面，成为一股强劲的社会思潮。明初，浙东的刘基、宋濂、王祿、方孝孺等人以事功或气节著称，于学术亦颇有建树。刘基著《春秋明经》、《郁离子》，有“一代宗师”之誉。宋濂传金华之学，调和朱陆，折衷儒佛，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王祿死于出使云南任上，以忠义名世。他曾和宋濂一起总裁《元史》之纂修。方孝孺是宋濂得意弟子，他以行《周礼》、明王道、黜异端为己任，彼称为“明之学祖”。明中叶前期，学术界处于“此亦一述朱也，彼亦一述朱也”的状况，思想僵化。其间，陈选、章懋、杨守阯、谢铎等人笃守朱学，黄

润玉、杨范由心学而朱学，杨守陈则兼取朱陆之长。这一时期总的趋势是朱陆合流，这种合流趋势对明中叶后期王学兴起了孕育作用。王阳明远承陆九渊的心本论，近接朱陆合流的趋势，创立“博大、精细”的王学体系。王阳明以“致良知”论，使朱陆关于知行的分歧得以合一，以“知行合一”论，把朱、陆的“立志”与“格物”浑融为一。王学的崛起，成了明代思想史的转折点。王阳明死后，王学发生分化，一派继续发展他的主观唯心论，在浙东的代表人物是王畿；一派着重发展王阳明提倡“力行”和“事上磨炼”的思想，代表人物是钱德洪、黄绾。明末的刘宗周是这一派的集大成者，使王学向唯物主义方向发展。明代浙东史学也有不少成绩，金賁享著《台学源流》，是一部简明的台州儒学史。王洙改编《宋史》成《宋史质》，王宗沐作《续资治通鉴》。胡应麟对于文献、考据，于文、史、目录、辨伪等方面，都有突出贡献。张岱的《石匱书》是现存第一部完整的纪传体明史著作。

四、清代

清代是浙东学术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出现了由黄宗羲开创的对全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浙东学派。章学诚曾指出：“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①这个学派在顺治间开始形成，中经康熙、雍正，直至乾嘉，先后连续了四代，涌现了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杰出的代表人物。其中，黄宗羲为第一代；第二代，万斯大，传黄氏经学，万斯同，传黄氏史学；第三代，以全祖望为代表，他私淑黄氏，传经史、文献之学；第四代，以章学诚为代表，他发展了史学理论，开创了古代方志学，并对浙东学术作了全面的论述。

清代浙东学派继承、发展了浙东学术史上的优良传统，不守门户之见，贵专家之学，重史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倡“经世致